



汽车穿过夜色与海风,把霓虹灯的缤纷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是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广西北海参加首届“珍珠节”。听说谢添、赵丽蓉晚上要到侨港镇跟观众见面,我便和一位记者同行追到侨港去。

他们是带着刚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两项大奖的新片《过年》,到这个城市举办首映式的。《过年》得的是“评委特别奖”,在片中扮演妈妈的赵丽蓉捧得“最佳女演员奖”。这两天里,他们接连跟观众见面,表演节目,然后放映影片,连干了四场,据说爆满的剧场创造了这个城市的历史纪录。我们因为忙于采访珍珠节的其他节目,竟未能一睹盛况。这晚到侨港镇是计划外的安排。谢添他们听说这里有一个早些年归国的难侨聚居的地方,便决定到这个离城十多公里的小镇加开一场。

大幕还没拉开。我的同行不失时机地在台侧采访赵丽蓉,听着这位年届花甲的著名评剧艺术家,讲述近几年退而不休的忙碌。讲述从电影《红楼梦》的刘姥姥,到电视连续剧《苍生》中的田大妈,一直到本月初获得国际大奖的艰辛。我坐在旁边,借舞台的侧灯,“默读”着谢添,脑海里“过电影”般地闪过他半个世纪以来所创造的角色和经手导演的一部部著名影片。这位已经78岁的影坛大师,这时正在向一位渔民询问,怎么用当地的方言,来表达即将表演的小品中的台词……

北影宣发处的老杨同志闪了过来。“是这么一回事——”老杨尽可能平静地述说着一件意外的事情。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我伸头往台下一看,果然,已到演出时间了,但这一千个座位的剧场里,只稀稀落落地坐着不到两百来客。也许,真如老杨了解的那样,由于今日天气难得地好,渔民都出海去了,还未回来。谢添、赵丽蓉不动声色,好似没事一样继续着他们刚才的话题。有点沉不住气的是他们的另两位同伴:首映式的主持人小姐,还有一位青年歌唱家。从北京来的这位小姐曾在十余部影视剧里充当角色,已是崭露头角的“星”了;而这位歌唱家,则是一部著名电影主题歌的主唱者,前不久才在首都开过颇为轰动的独唱音乐会。在他们铺满鲜花的艺术生涯中,这样的挫折也许是罕见的吧?更何况那两位已是登上巅峰的老艺术家,怎能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难堪呢?

迟疑了一下,主持人小姐还是提了出来:“是不是跟观众见一下面就行了,就不必表演节目吧?”赵丽蓉淡淡地说:“那不好吧,谢导!”

谢添站起来:“今天来的,都是特别热心的观众,怎能不演?一个节目都不少!”微弱的侧光,把谢添的脸镶成一尊雕像。一下子,他那严肃的脸又松弛下来,变得像他的喜剧影片中的人物那样可爱——“有十个人,演;五个人,演;两个人,演;要是只有一个人,那我有一个要

徐泓教授与我同龄、同校,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内蒙古沙漠边的一个小县工作。后相继回京,同在新闻界工作直到退休。但我却不知道她肚子里一直藏着一本大书,从未吐露。这就是新近出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经面世轰动学界,连我也目瞪口呆。

燕东园指的是老燕京大学的一批教授别墅,后并入北大,曾住过许多名教授,前后接续百余年,现已成受保护文物。徐教授是借古房子写人,这一点我们是相通的。十年前我因写《树梢上的中国》曾提出一个新观点,记录历史有三种载体:文字、文物与古树。殊途同归,我选择了古树,她选择了文物老屋。而且天降其人,这二十二年老房子至今还没有变更过住户的只有徐家了,而徐家能动笔写书的也只有她了。天降大任,她成了一颗燕京文物子遗仅存的种子。

我立刻想到1958年吉林省曾出土一颗千年前的古莲,经人工唤醒,居然发芽开花。作者的这部著作堪比古莲开花,令人拍

求——”台侧的人们都静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下文。略停了一下,谢添说:“要求你,你去小解的时候,告诉我一下……”大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老杨更是乐了起来:“您又抖包袱了!”

开场的铃声扫去了沉闷。主持人小姐容光焕发出场,接着是歌唱家绕梁的歌声,然后是谢添的小品及方言儿歌,再后来是“刘姥姥”的“载歌载舞”……掌声四起,献花踊跃。这些掌声远谈不上“雷动”,鲜花也不“如潮”,但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登车回城,留下银幕上下的人们去体验《过年》的悲喜。我的同行还要继续他的采访,他要写一篇介绍他们的经历与成就的专访,而我今晚有幸读到了他们台侧的一幕,觉得不必再问什么了。这样的艺术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待生活,对待艺术,对待人民,他们在银幕上的辉煌,也同样是

这晚的这件事,我的同行也许不会写进专访里去,历尽沧桑的两位老艺术家,过后对此也会淡忘的吧?作为亲历了这平常而又难忘的一幕的我,却不会忘记,事过30多年,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看着80岁的妈妈在午睡

崔妍
厨房的炉火上
旧砂锅里给妈妈炖的米粥散发清香
那是童年时就熟悉的味道
好像回到妈妈匆忙回家为我做午饭的那些中午
朋友发来夏天出游的邀约
去远方是空间的旅行
在爸妈身边也是一种旅行啊
穿越的是时间
风景是爸妈的暮色斜阳

四十多年前还有一些村庄没有通上电,村民晚上的生活照明就是煤油灯,能用上蜡烛就比较奢侈了。姑妈家离我们村有十多里路,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上学后每到假期父亲就会把我送到姑妈家小住。

姑妈家在村东头,院子挺大,我去了表哥表姐都让着我,姑妈也更宠我。姑妈家那房子中间是堂屋,堂屋两边的房间是卧室,我们称“里屋”,里屋各有一个大土炕,堂屋进门两侧是用土坯垒的灶台,灶台的深处连接着里屋的土炕,在堂屋柴架做饭余火就会顺着连接处窜到大炕里边,一年四季都是热炕头,当然冬天是最舒服的。在灶台和大炕连接的这面墙上有一个三十厘米见方的洞,这

养育

一个有情有义又有趣的人走了

张宝林
会和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分设后的首任和连任主席。他在残联这个平台上,慷慨地奉献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参加各种会议,接受各类媒体采访,南征北战,上山下乡,都不忘为智障人鼓与呼,并以自己为例,呼吁社会关注这些最困难的人。他当了几届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参与了许多与残疾人相关的提案。他经常深入全国各地的残疾人组织、培智学校,慰问残疾人工作者,为他们题词,为他们鼓劲。他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了对残疾人的社会关注度,也促成了许多助残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

王铁成卸任五年之后,我有幸连任了两届智协主席,和王铁成有了更多接触。我曾陪他到基层调研,感受他看智障孩子的眼神,一如看自己的儿子。他仍然关注着这些孩子们。有一年春节我去他家拜年。那几个月,全国发生了多起年边的家长无力照料重度智障孩子而导致的家庭悲剧。他忧心忡忡,说“我们老了,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引

了屋里,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准备好了挨打,姑父进屋后出来,手里拿的不是笤帚疙瘩而是我的布鞋,他蹲下摁了一下我的脚,问:“烫着没有?还疼吗?”边说边给我穿上鞋,我低着头,涨红了脸不知所措,姑妈一边捞出锅里油灯的玻璃碎片一边训斥着小表姐,这是一大家子的饭啊,尤其是姑父、大表哥、大表姐干了一早晨的田地活,累了回来要吃的早饭,结果被我一脚……唉!恨不得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姑父给我穿好鞋牵着我的手走到院子里,他默默地从厢房推自行车把我抱车上,我这才明白,他担心姑妈训我,骑自行车送我回家。一路上姑父都没责备我,自己闯了祸,小表姐在家替我挨训,我回到家是啥情

窝,一个筋斗一脚就踹了进去,只听见堂屋“咣”一声,随后姑妈大叫:“捣什么乱呢,油灯都弄锅里了!”我听到姑妈的呵斥声立刻静了下来,慢慢从炕上下来,光着脚走到堂屋的灶台前,刚才还透过窑窝看到锅里那金灿灿的玉米粥,此时布满了一层乌黑的煤油,窑窝下边墙上的一道黑色印迹直至铁锅边,部分油渍已渗进了锅边的土坯里,锅沿上的窝头和馒头上也布满了黑色油点。看到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也不敢吱声,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姑父从地里回来了,他看了看我没有吱声,转身进

窑窝里的煤油灯
焦金木

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我们根据他的要求,组织人力进行调研,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但是这件事毕竟太大,仅靠一个社会组织显然无法推进。我如实告知。他对我说,大的方案没有出台之前,我想捐一部分资金,探索为智障人士做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多年来,他曾为残疾人慷慨解囊,捐赠过许多资金和设备。这件事更说明,直到生命垂暮,他仍在为残疾人的生存境遇殚精竭虑,亲力亲为。可惜,不久他就生病了,这个设想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王铁成不仅是表演艺术

是打开新疆近代考古的一把钥匙。这本书被杨镰翻烂、看透,心中种下一粒知识的种子,二十年后杨镰成为卓有成就的新疆考古专家。

还有,当年的燕京大学从1934年就开始确立体育课为必修课,冬天必上的滑冰课,体育教授给一个学生打分,右腿打了4分,左腿打了3分。理

由是左腿蹬力不够。看到这里我脑子里总会浮想起一个老教授俯身在冰面上,侧头、瞪眼,仔细观察一个学生脚踏冰刀的动作。这得有多么负责的精神?在老燕京、老北大,知识连同这些知识的传授者的人品就是这样传承的。

他们的灵魂是经过煅烧和锤炼的啊。他们这整整一代学者,别无所求,只为求知,以知识报国。

一次我去看徐泓教授,她指着附近的一处老房子说,那曾是翦伯赞先生的家。我肃然起敬,

徐教授的一大批教授别墅,后并入北大,曾住过许多名教授,前后接续百余年,现已成受保护文物。徐教授是借古房子写人,这一点我们是相通的。十年前我因写《树梢上的中国》曾提出一个新观点,记录历史有三种载体:文字、文物与古树。殊途同归,我选择了古树,她选择了文物老屋。而且天降其人,这二十二年老房子至今还没有变更过住户的只有徐家了,而徐家能动笔写书的也只有她了。天降大任,她成了一颗燕京文物子遗仅存的种子。

七夕会

小表姐大学毕业分到了洛阳,并且在那里安了家。姑父姑妈先后去世,我都没有能够当面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去年出差去了洛阳,小表姐陪我去看了龙门石窟游览,当我们驻足在卢舍那大佛像前时,小表姐指着远处半山坡上的石洞笑着说:“兄弟你看那几,像不像以前咱们老家房子的窑窝?”我脸一红说:“像啊。”童年往事,倏地重现心头。

徐教授的一大批教授别墅,后并入北大,曾住过许多名教授,前后接续百余年,现已成受保护文物。徐教授是借古房子写人,这一点我们是相通的。十年前我因写《树梢上的中国》曾提出一个新观点,记录历史有三种载体:文字、文物与古树。殊途同归,我选择了古树,她选择了文物老屋。而且天降其人,这二十二年老房子至今还没有变更过住户的只有徐家了,而徐家能动笔写书的也只有她了。天降大任,她成了一颗燕京文物子遗仅存的种子。



繁花 (剪纸) 奚小琴 作